

檔案文獻與歷史研究

歷史的另—角落

吳銘能



自署

吳銘能 著



商禧印書館

历史的另一角落

——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

吴铭能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吴铭能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7175-8

I. 历… II. 吴…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729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历史的另一角落

——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

吴铭能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175-8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1/4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自序	1
你所不知道的梁启超	6
驳斥日本人捏造的谎言：梁启超撰拟对于《顺天时报》启 事	29
梁启超《年谱》被动了手脚	38
饮冰室的藏书	46
梁启超对于蔡松坡身后事的处理	70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78
梁任公与徐志摩的交谊	88
徐志摩与张幼仪“伉俪情笃”吗	100
除却文章无嗜好 世无朋友更凄凉：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生 活的片段	108
陈独秀晚年书札在台湾	144
读陈独秀书札后记	258
堂堂溪水出前村：雷震案真相大白	274

档案与口述历史之间：“口述历史”文字之更动与“二二八”事件研究	292
档案、校勘与历史真相——以黄彰健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为例	321
出版后记	338

自序

研究历史很不容易。有时候格于资料不易取得,有时候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有时候归因个人剖析史料的能力不足等,上述任何一项因素都会使得历史研究陷入团团迷雾之中,所以历史系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上一门“史学方法”课程,把研究历史各种可能的方法及阻碍,一一讨论清楚,为将来展开研究做准备工作。

只是,在实际处理这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经验累积多了,大学教的“史学方法”课程终究是纸上谈兵,能否依样画葫芦,或是巧妙运用,完全凭各人的本事。几年来,我断断续续读了许多人物的书信与档案,在爬梳史料之后,却发现我们所熟稔的历史名人,他们生活的另一面与众人公认形象往往大不相同,这就使我反省:为什么这些书信手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会与很多学者讨论的不一样?难道仅仅是别人没有看到这些资料呢?还是因为这些人物的资料太丰富了,不必去处理这一些琐碎的小细节?我做研究不喜欢人云亦云,跟着时髦走。我也不认为“琐碎的小细节”可以不必处理,这完全是偷懒或是没有找到新材料者的遁词。试想:如果我们要写某一人物的传记或年谱,要把这个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令读者心慕神驰,有所感动,这些“琐碎的小细节”可以不必处理吗?相反地,这些“琐碎的小细节”反而是个大问题,少了这些“琐碎的小细节”,人物如何能够描写得精彩飞动,予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梁启超是个才子，写文章是第一流的快手，下笔有如神助，笔锋带有情感的文字，风靡文坛数十年，不少人为他倾心着迷，毛泽东、胡适、郭沫若、钱穆、陈寅恪、李敖等人都对他十分肯定，但有谁知道他也有“执笔两小时，乃不成一字”的窘况？

梁启超是个有趣味的人，生活多彩多姿，饮酒、抽烟概不拒绝，也很爱打牌。他自己说：“我这位（不道学）的人最爱顽，五块钱一底的麻雀，每礼拜总要打一两场，但我的穷朋友打不起，近来已改为两块钱一底了。”这与许多历史学家研究的梁启超予人印象是很不一样的。最有意思的，他找到了一副新牌，兴冲冲地写信给牌友，只谈这一件事：“明日乘汽车，遵马路入京，携有新牌一副，欲即试之，望告文伯约人。”很难想象，大学者特地写信约人做“方城之战”！但读者切勿以为这只是偶一为之而已，另一封信也是专为了打牌而写：“沪函已发，决星期六人都小聚，星期一返津，请准备战地，并告舍弟。”这封信表明，梁启超把打牌视为重要的事，“请准备战地”，就是好好布置打牌的场地吧。为了打牌，郑重其事写信，这是真实的梁启超，这才是有人的味道。写梁启超传记的人，这些“琐碎的小细节”，能够忽略吗？

陈独秀在近代是个迭受争议的人物。他的特殊经历与政治上的禁忌，使得他的一生迄今没有哪一本书可以说得明白。

胡适白话文学运动的成功，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点就足以使陈独秀立于不朽的地位。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北大文科学长，可北大校园内有李大钊的石像，却不见陈独秀的同等位置，说明了历史人物评价真不容易，至少是很难公平的。他曾经担任过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晚年却被共产党开除党籍。陈独秀在台湾的命

运也不好,至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正当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被查封时,传记文学出版社后来发行了陈独秀的《实庵自传》,也遭到有关部门的查禁。一个在两岸都不受欢迎研究的人物,是个值得反省的现象。

历史浮沉变幻,令人难以想象。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度过风烛残年,几位好友之中,台静农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台先生早年与左派文人来往,曾经坐牢三次,他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陈给他的信件共有 100 多封,居然能够完整保存迄今,在台湾早期白色恐怖时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展读这批收藏在台湾大学图书馆的书信手札,吾人终于明白陈独秀晚年所以奋力写出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的意义,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主张中国文字必须推行拼音化,这是他自年轻到晚年一贯的信仰。中国文字拼音化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死路,但如果看到他为了一个古字的意思,文稿可以花八个月之久改写了五次,而且是躲着日军轰炸的艰困生活条件下完成的,你能不被其学术真诚与实践信仰的坚定意志所感动吗?他的诗写得很好,有真性情自然流露,书法也有个性。有一次,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诸人在端午节聚饮大醉,他失之交臂,事后闻知,不胜怅惋,恨不得与他们同欢畅饮,写下“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诗句,表现纯真至性的一面。

雷震是促使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先驱人物。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见解,胡适基本上是赞同的,而真正落实则是透过雷震《自由中国》杂志的宣扬。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悲剧性人物,他晚年的最后见解,在国、共两党夹击之下没有发挥的舞台,不过,他主张容许反对党的自由以及维护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的人权保障

等,在其身后一直被胡适、雷震等自由主义者所向往,成为不可忽视的精神支柱。尔后,雷震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进一步欲组织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后虽遭到当局逮捕而身系囹圄,胎死腹中,但其精神感召已深入人心。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二二八事件”。谈起“二二八事件”,迄今仍然有不少谜团待发掘。台湾黄彰健院士以中国传统史家排比资料的方法入手,又以严谨细腻的考证功夫,把档案一一解析,校正口述回忆不实处,对“二二八事件”的厘清,取得很好的成绩,他50万言皇皇专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于2007年2月已在台北出版,对于此“事件”应可拨云见日,真相大白。我厕身跟随他数个月的时间,也学习他校勘考证的绣花针方法,把曲学阿世的“御用学者”如何操弄历史、篡改“二二八事件”口述历史,予以揭穿,并指出口述历史的限制与如何操作的问题。近几年来,许多回忆录纷纷出笼,谈的都是当事人的切身经验,这些对某一段历史研究当然很重要,只是人的记忆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可靠,或有“情境氛围”影响,或有个人爱憎好恶,或有牵涉个人利害而有所隐讳,或有彼时耳目观察所局限等,各种因素,不一而足,因此谈起某些人物或某起事件,就不会是那么“准确”了。这些都是从事口述历史应当注意的细节,只是我看了很多的回忆录或访谈,都是“有话照录”,美其名是保留“原汁原味”,实际上是自己偷懒找托辞。历史研究,即使是口述历史,能够不努力蒐寻相关人物档案与同时代相关资料做精密的分析考辨吗?

这些文章大多先在《北京大学学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刊物发表过,有的还经过学者充分讨论后才定稿,现在把它们集结成书,取名为“历史的另一角落”,就是要谈出与人不同观点的新意,详人之

所略,略人之所详,但这并不是说我讲的完全都对,我很希望读者提出不同见解商榷,这才是学术的真谛。

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台湾大学文学院图书馆特藏室、“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单位提供珍贵手稿原件与外界极为罕见资料,这是我难以用言语表达内心感激的!

2007年3月20日自序于四川大学华西新村寓所

你所不知道的梁启超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学者名流文稿丰富,稿本现存有 1000 余种,堪称门类齐全,早已为学界重视。在 1987 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其质量精粹,史料价值极高,既有 人物事件、典章制度记载,也有语言文学的研究,广及经史子集各类。1994 年秋,笔者负笈北京就学,是年冬季利用课余闲暇时间饱览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稿本收藏,阅读有一二百通梁启超写给挚友的书信(有九成以上是写给蹇季常),在仔细拜读之下,兴味浓郁,配合重温丁文江、赵丰田编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①(以下简称《梁谱》)所引相关材料,始知《梁谱》固然引录许多书信材料,但也有不少遗漏,于是深入钻研,揭开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掌故,而在研究过程之中,也引发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详后讨论)。其次,透过书信的细览覃思,使吾人对历史人物梁启超的认识,也更加的深入与全面。

后人对梁启超的研究,大多从其一生所经历之若干过程谈起,于是对梁启超的印象,就以政治活动、办报论战、启迪民智与学术教育事业是极重要的部分,这些都是众人所熟知的梁启超印象,然而,他的私生活后人研究的却不多见^②,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梁启超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 1972 年版。

② 关于梁启超的私生活,晚近以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刊登于《民国春秋》1991 年第 1、2 期)以及张朋园《梁启超的家庭生活》(载于《近代中国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年 6 月版)这两篇文章最翔实。

就不免有所不足。当然他的门生故旧均作古已久,无从咨询,其子孙也无甚多印象^①,是原因之一,而传统“为贤者讳”的观念,也往往使人不欲深究,只知其一端,好在书信原件的梳理分析,恰可稍补这个缺漏。

一、对传统医学的态度

梁启超在1923年5月25日于《东方杂志》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即说:

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故考其来历如次。

同时也感慨国人:

将宇宙间无量无数之物象事理,皆硬分为五类,而以纳诸所谓五行者之中,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踞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吾辈最爱敬之中华民国国旗,是为此种观念最显著之表象;他更何论也。^②

如此看来,众所皆知的传统医学,就是阴阳五行观念所比附的产物,梁启超颇不以为然。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在发表这

^① 笔者曾于1993年4月访梁启超幼子梁思达先生及外孙女吴荔明女士,皆言已无甚印象。

^② 见《古史辨》第五册,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87年11月初版,第343、352页。梁氏发表此文时,中国南北方仍尚未统一,彼时中华民国以黑、蓝、红、黄、白五色条形旗为帜,正是战国时代五德终始学说之孑遗。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等观念与五德终始之关系,今人饶宗颐先生充分运用出土文物史料与文献相结合,提出若干新的见解,研究最为精到全面,详见氏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9月版。

篇文章之前,梁氏就已经接受中国传统医药的治疗,甚至于晚年在全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协和医院)治疗下,仍不放弃多次尝试中国传统医药,而且深信其疗效!

他在1918年9月12日给挚友蹇季常的一封信(见插图)说:

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田村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中之水,顷乃大讶其瘥瘥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①

由此可见他本瞧不起中国传统医学,但在试过疗效,“大讶其瘥瘥之速”之后,就“不敢菲薄”了。

1922年,梁启超赴济南、上海、南京等地讲学,因劳累过度,且与友人相聚痛饮,大醉而归。西医大夫检查出“心脏稍有异状”,可是他却“不觉什么”,继续他的讲学活动。在12月18日给女儿的信中有“前几天唐天如先生来,细细诊察我身体一番,说的确没有病”的话。^②

1924年梁夫人罹患乳癌酷疾,也曾尝试以中国传统医药治疗。^③

1926年2月,梁启超因血尿入德国医院医治。3月转进协和医院诊疗,大夫误割去右肾乙枚,仍未查出病源,便血依旧,社会舆论颇不谅解,梁启超也以为的确可以不必动手术。^④于是他改服

① 原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以下简称北大善本书室),《梁谱》收录在第546页。

② 《梁谱》,第624页。

③ 在4月4日致其女儿的信有“汝母服中药,日起有功”的话,见《梁谱》第657页。

④ 《梁谱》,第699—700页。

中药,也收到一时之疗效,令他很有信心。^① 往后病情时好时坏,迭次进出医院,但他对中国传统医药的疗效是笃信不疑的,由他建议朋友请中医大夫看诊^②,以及他医治的资料,均可见其端倪^③。

由以上材料,吾人可知梁启超既相信西医疗效,但在西医无法治疗痼疾之际,他并不排斥看诊中医,由他与夫人的治疗过程,即是例证。这点与鲁迅大肆抨击中医、进而否定传统的态度,可说是大异其趣。

二、阴阳五行与风水扶乩

梁启超既然以“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寻此逻辑,对于堪舆家以阴阳五行谈所谓的“风水”,梁启超应该不会太相信才对,可是事实不然,他不但相信“风水”之说,更可怪者,他居然也相信扶乩,而且躬身尝试行之。如梁夫人病危之际,梁启超对于坟地之选择可是大费周章,由下封他给蹇季常的信则知:

有一事欲奉商,昨行忘却,今补述。

汤家所订购之坟地内旧碑,前欲购取,公言不便,诚然,汤家地不买此碑,故必令其迁出,亦属正当办法,但默记卖主亦恐有为难之处,或致不成。今颇思以吾所新购之卧佛寺旁地与汤家互易。卧佛地本不恶(原右旁小字注:有堪舆家言甚

① 《梁谱》,第699—700页。

② 蹇季常生病,梁启超有信建议他请中医大夫看诊的话:“天如昨由津返京,盍邀彼一诊。”原件藏北大善本书室。

③ 1928年冬天,梁启超病情进入危险期,1929年1月15日徐志摩给蒋慰堂的信问到:“任师闻有转机,果人参有灵?抑天如之功?”徐信见《徐志摩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72页。

佳),其所不逮此地者,则缺树木及此碑也,请一商四嫂,若愿相让,则补价互易(原右旁小字注:贱地地价相若,惟亩数较少),但不必勉强,若四嫂感觉有一毫不便,则置之。

若四嫂有意,则告仲策陪四嫂往卧佛一看,又告策一看此地。^①

对于夫人病情无法根治,梁启超早已心里有数,所以寻觅卧佛寺旁预作坟墓的土地,相信堪舆家说风水甚佳,但他希望能有一块大旧碑,故有此互易的念头。今日梁家墓园位于北京近郊卧佛寺旁,墓园旧碑耸立,正是易地未成,花大笔金钱购得。

梁夫人在1924年9月过世,停尸广惠寺,在居丧期间,他给女儿的信提到扶乩的情形:

去北戴河时,我原想写一灵位,请去朝夕上食,扶乩说不必,那四十天也没有去上食了。想在我常常扶乩,每烧香后一两分钟便到了(原注:昨日中元别供水果而已),也不必用此具文了,你们意为何如?^②

梁夫人入土安葬择日,他也相信所谓的“黄道吉日”,于是把原拟定夫人葬期往前挪移。^③

以上这些举动,使我们很难想象竟是出自于写出〈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章以抨击迷信的梁启超,因为他们实在太不相称了。

① 原件藏于北大善本书室,《梁谱》未收录。

② 《梁谱》,第682页。

③ 他说:“初时本拟九月乃葬,经日者选定,谓八月十六日辰时为千年难得之良辰(原注:日者列传见《史记》,即择日也。此日者乃同乡一老进士),故提前半月赶工,中间曾有四日夜,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分四班轮做,二叔之辛勤,不可名状矣。”见《梁谱》第683页,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日给其孩子的信。

三、打牌——饮酒抽烟另一嗜好

梁启超 1922 年 8 月 6 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讲演“学问之趣味”，强调做学问当培养出趣味出来，生活才会觉得有价值，并以自己的经历勉励大家。在这场讲演中，他有一段话说得极为痛快：

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

接着他又把“趣味”下一个注脚：

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中略）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①

然而，梁启超自己又是如何呢？由他给蹇季常的一封信，吾人赫然发现首句正是“日来作何消遣”。^②

饮酒、抽烟及打牌，是梁启超极重要的休闲生活，饮酒到大醉

① 〈学问之趣味〉一文收入《饮冰室文集》（台北：中华书局 1960 年 5 月第一版）之三十九。

② 此信全文为：“日来作何消遣？据敬民所述，滨地于半年内外绝无良机，公索居彼间，乏朋友之乐，殊足损神害性，盍归乎来？吾久绝游戏，儿曹见其劳瘁，屡劝小憩，公来当作数日息也。”《梁谱》未收录，原件现藏北大善本书室。

而归,是屡见不鲜的。^① 打牌一次十几二十圈是常有之事。

根据资料,梁启超有一段时间,每周必定要和朋友打牌,而且兴致极为浓郁,不下于饮酒、抽烟与写文章。他自承“五块钱一底的麻雀,每礼拜总要打一、两场”^②。由他给朋友的信件中(见插图),屡屡出现呼朋引伴共约打牌的话:

明日乘汽车,遵马路入京,携有新牌一副,欲即试之,望告文伯约人。

另外一封信也有类似的话:

昨日守戒,今日宜为例战,已约印髯先来读碑,以余日讲武,公宜必至,并盼代约慕蘧也。^③

“例战”,即是照往常打牌也。

再一封信也是如此:

沪函已发,决星期六入都小聚,星期一返津,请准备战地,并告舍弟。^④

“准备战地”,即是准备打牌的场地也。其他的信件中,除了谈正事之余,也不忘附提打牌。如有一封信结尾说:

在都小住,并往西山厚生处作数日酣战,公有兴耶?^⑤

“作数日酣战”,即是放轻松好好大打几天牌的意思。

① 梁启超有饮酒习惯,一是“晚饭之酒,随饮食成习”,一是“独处不适,狂饮自遣”,关于此,张朋圆先生《梁启超的家庭生活》一文有详细讨论。

② 见《梁启超对于顺天时报启事》一文,此文稿原件现藏北大善本书室。详见笔者专文《一篇湮没七十余载的重要佚文——首次发表“梁启超对于顺天时报启示”原稿》,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③ 原件藏北大善本书室,《梁谱》未收录。

④ 同前注。

⑤ 同前注。